

● 宋志坚 著

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

● 厦门大学出版社

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

● 宋志坚 著

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

宋志坚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100

ISBN 7—5615—0342—3

K·63

定价：3.45元

自序

绍兴人是值得自豪的，因为绍兴是鲁迅的故乡。然而，绍兴人值得自豪的决不仅仅是鲁迅。从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起，或者更早一些，在绍兴的历史上接踵出现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实在也足以使人应接不暇。“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这很值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深入研究。

在绍兴的历代名贤之中，鲁迅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鲁迅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但他首先由稽山镜水所孕育。以鲁迅的著作，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为线索去追溯，我们不难发现，绍兴的历代先贤的精神、思想、学识，包括夏禹为民的勤劳卓苦之风，勾践复仇的坚确慷慨之志，从勾践到王思任、朱舜水，到秋瑾、徐锡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汉魏六朝唐宋明清绍兴为数众多的学者、作家在鲁迅的一生中所留下的痕迹。这决不是穿凿附会。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环境（几乎是“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阅读的书藉（诸如《鉴略》，《于越先贤像赞》之类），就使他对绍兴先贤有了粗略而深刻的印象。他在去南京和日本求学之前，翻阅类书，荟集逸书，校辑会

稽故书杂集，“集资刊越先正著述”，并以此“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而在此过程中，鲁迅对绍兴历代先贤的认识也更为深入、印象也更为深刻。这与鲁迅日后将绍兴历代先贤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从而为复兴中华民族作出杰出贡献，是有客观之联系的。

1911年1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但后来的事实却足以使人感到欣慰。在鲁迅的同代人中，绍兴名贤也如群星灿烂。绍兴出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许寿裳，诗人刘大白，文学家夏 尊，经济学家马寅初，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社会活动家周建人、胡愈之等现代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并且，他们与鲁迅之间，都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在思想上，事业上也互有或多或少的影 响。可以这样说，包括鲁迅在内的这些绍兴现代名贤，在为中国以至整个人类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使于越山水大增其色。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除鲁迅之外，还有一位以绍兴为故乡的伟人周恩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生前与周恩来未曾谋面。然而，鲁迅后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所表达的真挚的、崇高的敬意之中，就有对于周恩来的真挚的、崇高的敬意。周恩来也曾多次赞颂过伟大的鲁迅精神。但周恩来毕竟出生在淮安，绍兴仅是他的祖籍，较之鲁迅，他受绍兴历代先贤的影响，他与绍兴同代名贤的接触，其角度就有所不同。要不，我们也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写出一部《周恩来与绍兴历代名贤》的著作来的。

至于鲁迅对于他以后的绍兴名贤的影响，我想借用著名作家柯灵的一句话来概括：“三十年来，他坚定不移地实践这誓言，‘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流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就都曾受过他的血的哺育而成长，一往无前，争取他所指明和向往的‘将来’”。柯灵说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并不局限于绍兴一地；但绍兴的后学，直接受过鲁迅的血的哺育成长起来，为人类的进步，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的，如从朱自清算起，确也甚为可观。受鲁迅精神之影响而成长的就更不计其数。

我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想找出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的精神之联系，希望能为鲁迅研究提供一点线索，同时勾勒出以鲁迅为轴心的绍兴历代名贤图的轮廓，希望能对发展绍兴的旅游业有所补益。其中，也有“用遗邦人”，“供其景行”的意思。我是绍兴人，自有“不忘故里”之情与效力桑梓之心，因而，此举也难免会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之嫌，但只要“矜”之有理，“美”之有据，并于世人有益，也就不想避嫌以示大雅了。

本书分为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三个部分。书名既为《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文章就得做在互相间的联系之上。鲁迅与绍兴古代先贤的联系，当然只有“神交”的联系；鲁迅与近代和现代的名贤，则有“神交”也有“身交”。列入本书的绍兴历代名贤，大致都具备三个要素：一，须是绍兴人（也包括原籍绍兴或较长时间在绍兴的）；二，须是名贤（衡量的标尺是贡献、影响而不是官

衔);三,须与鲁迅有联系(包括“神交”与“身交”的联系)。绍兴的历代名贤自然不只是列入本书的这一些,但有的名贤,例如古代的刘宗周、葛云飞,现代的竺可桢、陈建功,并无资料能证明鲁迅与他们有任何联系(或接触),于是也只能割舍。有的名贤,如古代的贺知章、陆游,现代的马寅初、刘大白,对鲁迅或有影响而影响不大,与鲁迅或有接触而接触不多,虽已列入本书,但也只能如实而论,决不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而任意渲染,夸饰鲁迅与他们的联系。我想,假如鲁迅亡灵有知,对任何强加于他的做法,都会敬谢不敏。

绍兴是名贤辈出,名流荟集之地。作为绍兴人却不能因此而洋洋自得。靠“先前阔”来荣耀门庭,抬高身价,是决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我们这一代人,也当这样来激励自己。

1988年8月27日于福州



谨以此献给鲁迅诞生110周年
谨以此献给生我育我的故乡

目 录

自序	(1)
----------	-----

古代篇

鲁迅与夏禹	(1)
鲁迅与勾践	(8)
鲁迅与范蠡	(14)
鲁迅与朱买臣	(15)
鲁迅与王充	(17)
鲁迅与袁康 吴平 赵晔	(19)
鲁迅与谢承	(21)
鲁迅与朱育	(23)
鲁迅与嵇康	(25)
鲁迅与谢沈	(33)
鲁迅与虞预	(34)
鲁迅与贺循	(36)
鲁迅与孔灵符	(37)
鲁迅与谢安	(38)
鲁迅与王羲之	(40)
鲁迅与贺知章	(44)
鲁迅与元稹	(46)
鲁迅与陆游	(48)
鲁迅与徐文长	(50)
鲁迅与陈洪绶	(52)

鲁迅与王思任	(56)
鲁迅与张岱	(59)
鲁迅与朱舜水	(62)
鲁迅与章学诚	(65)
鲁迅与赵之谦	(67)
鲁迅与李慈铭	(69)

近代篇

鲁迅与徐锡麟	(72)
鲁迅与陈伯平 马宗汉	(75)
鲁迅与秋瑾	(76)
鲁迅与陶成章	(82)
鲁迅与王金发	(87)
鲁迅与范爱农	(92)
鲁迅与孙德卿	(97)

现代篇

鲁迅与蔡元培	(100)
鲁迅与许寿裳	(109)
鲁迅与陈仪	(120)
鲁迅与陶冶公	(123)
鲁迅与马寅初	(126)
鲁迅与刘大白	(129)
鲁迅与夏丏尊	(132)
鲁迅与周建人	(138)

鲁迅与范文澜	(144)
鲁迅与胡愈之	(149)
鲁迅与朱自清	(155)
鲁迅与孙伏园	(159)
鲁迅与孙福熙	(165)
鲁迅与川岛	(170)
鲁迅与许钦文	(175)
鲁迅与陶元庆	(183)
鲁迅与孙席珍	(190)
鲁迅与魏金枝	(194)
鲁迅与徐懋庸	(198)

鲁迅与夏禹

绍兴古称会稽，而“会稽”这个地名则由禹而来。司马迁说：“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史记·夏本纪》）这就是“会稽”的来历。

绍兴古称于越，而“于越”这个称号，也和禹有关。据晋代贺循的《会稽土地记》云：禹的儿子启，每年春秋都派使者来此祭禹。到第六世少康，恐禹祭绝祀，就“封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

禹的后裔姒氏家族以后就一直定居于越。越王勾践，就是禹的后代，“其先，夏少康庶子也”。（清 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直至今日，绍兴禹陵一带，尚有姒氏居民三十余家。

大禹陵在绍兴市东南 6 公里的会稽山麓，亭碑上刚劲端庄的“大禹陵”三字，系明代绍兴知府南大吉手书。据史书载，夏启和少康都曾在此建过禹祠，但已无从查考。现在大禹陵右前侧的禹庙，始建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梁初，是一组宫殿式的建筑群，庙宇几经兴废，现存建筑仍保留明清时的规模与风格。禹庙内有不少重要碑刻。窆石亭内的窆石，高 2 米，围 2 米余，相传为大禹下葬之工具，石上刻有汉以来的多种铭文。转门内的佹佹碑，凡 77 字，蝌蚪篆，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原刻在湖南衡山，明嘉靖二十年（1541 年）知府张明道以岳麓书院本翻刻于此。大殿内大禹塑像高 5.85 米，手捧玉圭，身披玄衮，雍容大度，神采动人。两边立柱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的

楹联，殿顶有“地平天成”四个大字，称颂禹的功德。

禹是四千多年前的夏后氏部落长，炎黄部落联盟领袖，夏朝的创立者。姒姓，亦称大禹、夏禹、戎禹。曾继其父鲧之后，奉命治理洪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水英雄。绍兴各地，有不少关于禹的传说。

相传夏禹治水到大越，在深山遇见一位叫女娇的姑娘。这位姑娘仪容秀美，对禹有爱慕之心，禹也很满意，就娶她为妻。婚后第四天就离别女娇前往各地治水。以后曾多次途经家门，有一次还听到儿子启的哭声，都因忙于治水而没有进去探视。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这深山就在绍兴稽山门外，现仍名深山。

夏禹治水途经今绍兴与肖山接壤的地方，失落一只履，以后当地百姓感念他治水的功德，在夏禹失履的地方立了一座桥，命名“夏履桥”。这“夏履桥”就在今绍兴钱清区境内，可惜现已改为水泥桥。

绍兴嵊县的禹溪，原名“了溪”，据《嘉泰会稽志》载，“夏禹治水，毕于了溪”，因此更名。禹溪村南的余粮山，原名“了山”，相传禹治水于此，弃余粮，化为石，由此得名。宋王十朋有《余粮》诗云：“禹迹始壶口，禹功终了溪。余粮散幽谷，归去锡元圭。”

禹在茅山（即会稽山）召集各地诸侯计功封爵时，有一个叫防风氏的诸侯不服指挥，禹下令将他诛戮示众。这防风氏身高三丈余，执行刑罚的人筑起高台，站在高台上将防风氏处以极刑。后人引以为鉴，将此高台称为“刑塘”，并用它作为该地村名，这就是现在绍兴柯桥区内的型塘村。

鲁迅，就出生在这块到处留有大禹足迹的土地上。他从小就熟读上起盘古，下至明代的《鉴略》，对于大禹这位古代的英雄，他并不陌生。辛亥革命前后，当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对

这位古代英雄的情感更显得格外强烈。1910年春,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曾带学生一起去禹陵远足,在禹王殿前的石阶上拍照留念。1911年,鲁迅又与周建人、王鹤招一起到禹陵。他曾在《辛亥游录》中写道:“三月十八日,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周建人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对此行有更详细的记载:

我们还去过禹陵,三人出稽山门,沿着筑在水中的石板塘走,一路上山明水秀,美不胜收。禹陵背负并不很高,但很秀丽的会稽山,环境幽静。刻着“大禹陵”三字的石碑和亭子,显得十分古朴庄严。附近有庙,进庙门,就有一块佝偻碑,走上“百步金阶”到大殿,就看到大禹立像。殿东是窆石亭,大哥仔细地观看上面刻的字,……

1917年,鲁迅写了《会稽禹庙窆石考》一文,对窆石的名称,窆石的损阙,窆石的来历以及汉以来历代歌颂大禹功德的铭文一一作了考证,翻阅了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杨龟山的《嘉泰会稽志》、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俞越的《春在堂随笔》等大量资料。鲁迅考窆石之拓片,应是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所寄,但他考证窆石的契机,是在1911年与周建人、王鹤招一起去禹陵“仔细地观看(窆石)上面刻的字”的时候就萌生了的。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多次瞻仰禹陵,深入考察有关禹的史料,不是没有原因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不少革命志士,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回国后直接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较新的角度,从较高的时空跨度上来认识大禹这位古代的英雄。他感到,华夏故物的光复,中华民族的振兴,都需要有一种禹的精神,禹的风范。1912年,鲁迅在为绍兴《越铎日报》创刊号写的

越铎》出世辞》中说：“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鸢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鲁迅所说的“古先哲人”，首先就是大禹。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大禹精神和大禹风范，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卓苦勤劳之风”。

1935年11月，鲁迅在写历史小说《理水》时，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并赞颂了大禹的这种“卓苦勤劳之风”，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实干精神。鲁迅这样刻画大禹及他的随员的形象：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脚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满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而他的随员们，也是“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坐着的时候，“象铁铸的一样”，这是他们考察和治水归来时的情形，和那些高高在上的“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禹不会对舜说好话，他想的只是治水。当文化山上的那些学者们议论“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因为“他是鲧的儿子”，甚至胡说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的时候，禹和他们随员们正在为治水到处奔走，“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这和别的大员们的考察——第一天和一些清谈家谈了半天，让他们合拟一个条陈；第二天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赏偃盖古松，钓黄鳝，一直到黄昏；第四天，说是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午后，才传见下民代表，也叫他们合拟一个“贡献善后方法的条陈”——也有天壤之别。

二、忘我精神。“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大禹体恤老百姓的苦难，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水的大业之中。他“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大禹和“下民”共甘共苦，“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稷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

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调有余，补不足。搬。大家这下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没有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没有这种与“下民”同甘共苦的品格，这治水的大业是完不成的。

与大禹相反，那些“大员”和“学者”则视“下民”如草芥。在他们眼里，“下民”都是以“善于吃苦闻名世界”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而，灾情再大，也“并不算重”，饥荒再重，也“还可敷衍”。他们治水的诀窍就是“募捐”所得供他们的挥霍。鲁迅这样描绘“大员”们回京时的情景：“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福、禄、寿三种，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些水乡沿途的风景……。”

三、开拓精神。大禹实地考察“山泽的情形”，广泛征求“百姓的意见”，确认他父亲鲧的治水失误，就在于“湮”。他提出：“‘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尽管那些“大员”们嚷嚷说：“湮是老大人的成法，”“‘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甚至搬出古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要禹“照例治下去”，“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尽管有流言蜚语说禹为的是“求名，图利”，但他却泰然得很：“说就是了”。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大禹敢于破除陈规，走出新路，也很有“三不足”的气魄。

《理水》是“故事新编”，隐指现实，其中有不少人（例如“水利局”的“官员”：例如“乌头先生”，“伏羲朝的小品文学家”，“文化山”上的“学者”）和不少事（例如“募捐”）是有所指的。但对于禹的“卓苦勤劳之风”，却有史料的记载为依据，并非信口雌黄，鲁迅是在广泛收集、深入研究关于大禹的史料的基础上写出《理水》这篇杰作的。

三十年代的中国，兵灾、水灾连绵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趁火打劫，大发其国难财，清谈家也只顾清谈，鲁迅在《理水》中揭露了这些贪官污吏和清谈家的可鄙咀脸，衬托了禹的高大形象，在大禹的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理想。鲁迅歌颂大禹是别有深意的。这可以在他写《理水》前后的杂文中找到线索。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古代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英雄人物，自然也包括着大禹这位先贤。现在的呢？1936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作了明确的回答，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实干精神中，看到了大禹的风范。

禹的“卓苦勤劳之风”，也是鲁迅所终身服膺的。大禹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鲁迅则是为了千千万万个被“饥荒、苛税、兵、匪、官、神”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润土，“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有时简直一面吃饭，一面做事”，（《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鲁迅很少为自己的生活去耗费精力，他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他“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觉得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两地书》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鲁迅不尚空谈，他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不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书简》一九三五年六月）甚至到他临终之前，还想着要“赶快做”，要别人“忘记我，管自己生活”。